

论古代埃及文明和爱琴文明的关系

郭 丹 彤

(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 由于埃及与爱琴文明隔海相望, 因此两地之间的联系集中表现在海上贸易和外交往来上。按时间顺序埃及和爱琴文明之间的海上贸易和外交往来被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席克索斯王朝时期埃及通过塞浦路斯这一中间人与爱琴文明中的米诺埃文明的联系; 第二阶段是新王国时期埃及与爱琴文明中的迈锡尼文明的直接联系。埃及与迈锡尼的联盟是松散的经济贸易合作, 它绝不是那种相对稳固的政治联盟。埃及与爱琴文明的贸易往来是单纯的官方行为, 并与爱琴文明中的米诺埃文明的衰落和迈锡尼文明的兴起有着内在的联系。

[关键词] 古代埃及; 爱琴文明; 贸易
[中图分类号] K411. 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6201(2005) 06- 0011- 05

爱琴海诸文明主要包括米诺埃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米诺埃文明以克里特岛中北部的克诺索斯城为中心, 时间应该在公元前 1800 年到 1450 年, 与埃及的第二中间期(约公元前 1786—1550) 以及图特摩斯三世(约公元前 1479—1425) 以前的新王国第十八王朝相对应。迈锡尼文明以兴起地迈锡尼城而命名, 该文明兴盛的时代在公元前 1550—1200 年, 这一时期与埃及新王国第十八王朝以及阿蒙美西斯(公元前 1203—1200) 以前的新王国第十九王朝(公元前 1295—1186) 相对应。大约在公元前 3000 年以后, 克里特岛开始了与埃及的时断时续的贸易, 与此同时来自于希腊本土的商人们也开始了与埃及以及近东其他地区的远程海上贸易, 但是爱琴海诸岛与埃及以及其他近东各地的连续不断的大宗贸易则出现在米诺埃文明和迈锡尼文明时期。

一、席克索斯王朝时期埃及和米诺埃文明的贸易及外交往来

目前现有的证据告诉我们埃及和爱琴文明的联系始于公元前 17 或 16 世纪的埃及第二中间期时期的席克索斯王朝统治时期(约公元前 1648—1540) , 也即巴勒斯坦的青铜中期文化的二期。

在席克索斯王朝与其一衣带水的邻居的联系上仍存在着许多问题, 尽管我们已经拥有了来自于克诺索斯的刻有席克索斯王朝的国王黑延(Khyān) 铭文的这一十分有利的证据, 但除此之外我们似乎就没更可靠的有关这一时期埃及和爱琴文明关系的证据了。在埃及我们没有发现属于米诺埃文明的物件, 虽然在克里特和希腊本岛埃及的物件有所发现, 但数量很少。据此我们推断, 如果埃及和爱琴文明之间的确进行过贸易活动, 那么它们贸易的商品应该是那些不易保存的, 不能给后人留下任何考古证据的物件。在爱琴海诸岛, 我们发现的诸如象牙等纯原料肯定源自于东方。而那些数量不小的金属原料, 如金、银、铜和锌的来源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爱琴文明的出口产品主要是纺织品、橄榄油、香水、香料、药材、皮革等, 各种农产品, 以及奴隶^[1](P45- 49)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物品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

[收稿日期] 2005- 05- 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5CS001)
[作者简介] 郭丹彤(1968-), 女, 吉林德惠人,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授, 历史学博士。

考古证据。

最近,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关于爱琴文明和埃及以及西亚之间联系的证据,这就是在巴勒斯坦的考古遗址泰尔-卡布瑞(Teil Kaburi)和埃及席克索斯王朝的首都阿瓦利斯(Avaris)(考古遗址名字为泰尔-艾尔-达巴,Teil el-Da'ba)发现了爱琴文明风格或与爱琴文明风格极其相似的壁画^[2](P121)。来自于泰尔-卡布瑞的壁画有两幅。一幅实际上是一块具有爱琴文明风格的石膏棋盘,另一幅是典型的壁画,尽管仅仅留存下来了一小部分,但它所反映的人物和景物,如建筑、河流等,却具有典型的爱琴文明的特征。在阿瓦利斯人们发现了一系列壁画残片,这些壁画残片绘有公牛、斗牛者、植物山水、人物以及其他动物,这些景物都带有浓厚的爱琴文明的色彩,从而成为我们考察这一时期埃及和爱琴文明之间联系的重要证据。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年前在阿拉拉哈(Alalakh)考古遗址也发现了与在上述两个遗址所发现的相类似的石膏壁画,这些壁画中同样也描绘了爱琴海地区的景物,如公牛、山水、植物等。

或许在席克索斯王朝,也即巴勒斯坦地区青铜中期文化的二期的晚期,在环东地中海沿岸有一种壁画风格十分盛行。该壁画起源于爱琴文明,并传播到叙利亚巴勒斯坦沿海地区以及埃及的三角洲。在这些爱琴文明壁画出土的遗址,人们没有发现其他的诸如爱琴文明的建筑、陶器或其他物件。因此这些壁画也就成了我们揭示爱琴文明和埃及以及西亚之间联系的最为重要的证据。

很明显,如果我们仅凭上述有限的证据去揭示爱琴文明和埃及的关系,其结论势必会出现偏颇。因为物件和壁画所揭示的两地联系无法与建筑、语言以及丧葬习俗所揭示的联系相提并论。因此考察爱琴文明和埃及的联系需从埃及席克索斯王朝统治时期克里特岛的米诺埃文明和所谓的“席克索斯文化”的经济扩张入手。

埃及席克索斯王朝统治时期,在爱琴海诸岛,米诺埃文明扩张到了西克拉德斯(Cyclades)、希腊半岛南部和小亚沿岸地区。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巴勒斯坦人的青铜文化二期文化扩展到了埃及的三角洲地区,进而在该地区建立了席克索斯王朝。然而如果我们就此认为这两个文明扩张的结果是经济和政治帝国的建立,那么我们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它们的对外扩张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的增长和对对外贸易的渴望,而决非出于政治野心,它们与被扩张地的关系是一种贸易伙伴间的松散联盟,而决非是那种联系密切组织严谨的国际政治同盟^[1]。上文提及的那些证据告诉我们爱琴文明和埃及彼此了解但联系并不密切。在许多方面它们有着各自的利益。米诺埃文明的经济主要依靠于海上贸易,他们势力范围应该是在爱琴海。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居民居住在陆地,他们是通过陆路扩张到埃及三角洲地区的。这些证据中的多数是外交礼物,当爱琴文明的官方使节前往埃及的时候,一些艺术家也随团前往,因而也就留下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壁画。而那些数量极少的物件则是两地通过中间贸易获得的。

尽管关于它们之间直接贸易的证据十分有限,但是到席克索斯王朝的晚期至少一些商品是通过贸易得到的。埃及和西亚需要爱琴文明的羊毛、纺织品、皮革、葡萄酒以及橄榄油,克里特岛需要埃及和西亚的纯原料,特别是金属原料以及象牙、珍贵木材、玻璃和一些奢侈品,于是它们的贸易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生。贸易需要商人,于是在埃及、西亚以及克里特岛应该有一些两地的商人出现,但至今我们也没有发现任何有关两地商人出现在对方土地上的证据,因此它们之间存在着直接贸易似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是谁充当了它们之间贸易的中间人?为此塞浦路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从地理位置上看,塞浦路斯位于埃及和爱琴文明之间,在这一时期两地的考古遗址中来自塞浦路斯的商品数量非常大,这表明塞浦路斯分别与两地的联系要比两地之间的联系密切的多。于是我们发现塞浦路斯在不经意间充当了爱琴文明和埃及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我们也看到席克索斯王朝为埃及的新王国以及巴勒斯坦地区的青铜晚期文化的许多重要的特征奠定了基础。后来在近东地区出现的贸易网络就源自于这一时期。新式武器装备——战车匕首、金属物品以及和艺术和技术的创新也都首创于这个时期。更为重要的是青铜晚期或新王国时期近东各国势力范围的雏形也形成于这个时期。

二、新王国时期埃及和迈锡尼文明的贸易及外交联系

埃及的新王国时期或巴勒斯坦青铜晚期文化时期,埃及和爱琴海诸岛分别被新王国和希腊半岛南部的迈锡尼文明统治着。这两个强盛的帝国分别是埃及的席克索斯王朝和米诺埃文明扩张的结果。它

们都对对外贸易有着浓厚的兴趣，它们的对外扩张都是为了他们各自的荣耀。正如席克索斯王朝统治时期为新王国时期埃及对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统治奠定了基础，米诺埃文明时期也为迈锡尼文明扩张到希腊南部提供了先决条件。

以克里特—希腊—西克拉德斯为链条的经济圈和以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为链条的经济圈在青铜中期文化晚期或席克索斯王朝统治时期已经初见端倪。这两个经济圈之间的联系是间接和松散的，因为在地理位置上它们相距甚远，根本构不成对彼此的威胁。伴随着塞浦路斯作为中间人的出现，他们试图互相联系的愿望越发强烈起来，由此也就导致了后来的强盛的新王国和迈锡尼文明的出现。

新王国时期，希腊本岛和爱琴海诸岛与埃及保持着密切的友好往来，到公元前 1520 年，爱琴文明已经被埃及人所熟知。罕克(Hankey)认为，发现于迈锡尼的带有埃及新王国时期第十八王朝时期的国王阿蒙霍特普三世王名圈的陶瓷，以及发现于阿蒙霍特普三世的位于寇姆—艾尔—海坛(Kom el—Hetan)享殿中的爱琴文明的地名表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她认为地名册是阿蒙霍特普三世派往爱琴文明的外交使团的路线图，由此她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考古证据揭示了彩色陶瓷和来自埃及的外交使团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3](P46)另外在迈锡尼文明其他地方带有阿蒙霍特普三世或她的妻子泰伊(Tiye)的王名圈的物件也有所发现。如果埃及人，无论是官方使节还是民间商人，曾经在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访问过迈锡尼文明，那么这些埃及人在返回埃及的时候势必会随身携带着一些迈锡尼文明的物件。于是在埃及的某些地区，特别是在底比斯地区出现了包括陶瓷在内的迈锡尼文明的物件。其他的遗址，如瑞弗(Rifeh)和古拉布(Gurob)，也包含了迈锡尼文明的陶器。另外在阿玛纳和塞斯比(Sesebi)也出土了数量巨大的迈锡尼文明的陶器。

埃及语文献中对于爱琴人称谓的变化反映了第十八和第十九王朝时期埃及和爱琴文明关系的变化，如 kftiw, iww hryw—ib 以及 Tnj 等。科林(Cline)的研究表明 kftiw 一词在公元前 15 世纪的埃及语文献中出现了 16 次，14 世纪的文献出现了 2 次，13 世纪的文献出现了 3 次，而 12 世纪的文献则仅仅出现了 1 次。该词 3 次出现于阿蒙霍特普三世的地名册中，但却没有出现在其继任国王埃赫纳吞的文献中^[3]。在这些文献中该名词往往被翻译成“克里特人”和“米诺埃人”。关于 iww hryw—ib(直译为“大海中的小岛”)，这个时期出现在埃及语文献中的频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通常该词组被翻译成“迈锡尼人”^[4](P3)。按照科林的观点，在第十八王朝结束之前 iww hryw—ib 一词共出现过 7 次。尽管该词组在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的文献中从未出现过，但在埃赫纳吞的文献中却出现过 2 次。Tnj 一词，很有可能指 Danaoi，也即希腊本土，出现于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爱琴文明地名册》和他的刻写于卡尔纳克阿蒙—拉神庙中的《外国地名册》。该单词也出现在埃赫纳吞的文献资料中。这些单词或词组出现的频率揭示出埃及与米诺埃文明的联系在公元前 15 世纪以后出现倒退的迹象，与此同时与迈锡尼文明的联系却呈上升的态势。

埃及人对迈锡尼人的描绘进一步揭示了 15 世纪以后埃及和迈锡尼关系的变化。这样的描绘多出现于坟墓之中，而且时间断限也很明确，即从第十八王朝的法老哈特普苏特(公元前 1479—1457)到埃赫纳吞(公元前 1352—1336)的这一时间断限内。在大约 50 座绘有外国人图像的壁画中只有 10 座有对迈锡尼人的描绘。最早绘有迈锡尼人形象的壁画出现在哈特普苏特统治时期的大臣森姆特(Senmut)的坟墓中。其他拥有明确迈锡尼人形象的坟墓还有乌塞—阿蒙(Use—amen)和拉赫米拉(Rakhmir)的坟墓，这两座坟墓皆属于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期。在以后的几代埃及国王统治时期迈锡尼人的形象也偶尔出现于埃及人的壁画和浮雕中。来自于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的坟墓壁画和来自于埃赫纳吞统治时期的坟墓壁画中的迈锡尼人的形象，是最后的有关埃及人对迈锡尼人的描绘。埃赫纳吞之后的第十八王朝的其他国王统治时期，迈锡尼人再也没有出现在埃及人的艺术作品中。

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期是被明确勘定的迈锡尼人出现在埃及艺术作品次数最多的时期。以后的时期，即阿蒙霍特普二世、图特摩斯四世、阿蒙霍特普三世以及埃赫纳吞统治时期，埃及壁画中出现的迈锡尼人的形象包含了许多错误的描绘，这也许是对迈锡尼人的了解不够充分造成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十八王朝时期埃及艺术品中的迈锡尼人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在该王朝的后期艺术品中的迈锡尼人形象严重失真。迈锡尼人的形象出现在阿蒙霍特普三世和埃赫纳吞统治时期的坟墓壁画中的记录分别只有一次。很有可能这一时期迈锡尼人几乎绝迹于埃及社会。

事实上,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埃及和迈锡尼文明联系的最有利的证据是出土于迈锡尼文明的带有埃及国王王名圈的物件。数目相对巨大的带有埃及王室铭文的第十八王朝晚期的物件被发现于迈锡尼文明似乎暗示我们公元前 14 世纪的早期埃及和迈锡尼文明的联系呈上升态势,我们知道公元前 14 世纪是迈锡尼文明的重要时期。如果带有阿蒙霍特普三世名字的物件是在米诺埃文明被毁之后被带到爱琴海诸岛的,那么埃及和迈锡尼文明的联系呈增长的趋势应该是迈锡尼人扩展经济圈的结果。罕克曾猜测正如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爱琴文明地名册》所记载的,埃及人对迈锡尼文明的访问很可能是对较早时期迈锡尼人对埃及访问的回应。出现于第十八王朝早期坟墓壁画中迈锡尼人的形象和迈锡尼文明的陶器,以及与此同时埃及物件在迈锡尼文明的出现的相对减少,说明埃及和迈锡尼文明的早期联系是迈锡尼人访问埃及,而不是埃及人访问迈锡尼文明。

第十八王朝时期埃及在地中海地区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5]。按照莱德弗德(Redford)的观点,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是埃及国力的顶峰,他是地中海世界至高无上的领袖,他通过游说、外交礼物、联姻以及潜在的军事威胁来实现他的外交政策^[6](P55-56)。

带有阿蒙霍特普三世及其王后泰伊名字的物件在爱琴海诸岛,尤其是在迈锡尼城的大量出现反映了埃及帝国的世界性。大约在 70 年前格鲁兹(Glotz)在评价克诺索斯衰落时说:“这场灾难与迈锡尼国王和埃及法老之间所进行的礼物交换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在迈锡尼文明代替米诺埃/克里特文明的那一时期,刻有阿蒙霍特普三世和泰伊王后的名字的陶器大量出现,这表明迈锡尼的国王们与埃及法老之间有过大宗的陶器交换活动。”尽管他的论断只是一种推测,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潜在的价值的,很可能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新的思路。从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爱琴文明地名册》中我们发现,在 11 个可以勘定的地名中有 6 个位于克里特岛,但是迈锡尼却是出土埃及陶器最多的遗址,这说明我们在迈锡尼有着广泛的考古发掘,因此该遗址中出土的陶器最多是不足为怪的。在所有爱琴文明遗址中迈锡尼是惟一的一个除了拥有圣甲虫护身符外还拥有阿蒙霍特普三世及其王后物件的遗址。该遗址不仅拥有阿蒙霍特普三世和其王后的物件,而且还拥有许多其他时期的刻有国王名字的陶器。《爱琴文明地名册》展示了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埃及对新老爱琴文明,即米诺埃/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的了解。我们已经提到地名册中的大多数地区在克里特和其附近的岛屿,在埃及与米诺埃人进行贸易过程中埃及人开始熟知这些地区。其余的地区,“伊里奥斯”除外,都应该位于希腊本岛,比如迈锡尼、纳普利亚和迈锡尼亚。在这三个遗址中,迈锡尼和迈锡尼亚是当时希腊半岛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因此,《爱琴文明地名册》是爱琴文明内部势力变化的外在反映,该地名册反映新旧两个政治中心的转换。

根据上述资料,包括《爱琴文明地名册》,被发现于埃及的迈锡尼文明的精美的陶器,以及被发现于迈锡尼以及其他地区的刻有阿蒙霍特普三世及其王后名字的物件,我们便可勾勒出一个青铜时代晚期埃及和爱琴文明中的迈锡尼文明之间的关系的大致轮廓。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爱琴文明地名册》应该是那一时代的可信的文献,它记录了在这个国王统治时期埃及人对爱琴海诸岛的访问。而那些拥有阿蒙霍特普三世及其王后物件的遗址和该地名册中记录的地址的相一致性更加证明了该地名册的可靠性。出土于迈锡尼的四个或更多的精美陶片进一步揭示了当时的埃及曾向迈锡尼文明派出过官方使团。而出土的手工制品,壁画以及文献资料的多寡则准确地反映了第十八王朝时期两地关系的波动。被发现于迈锡尼文明,特别是迈锡尼城的大量的阿蒙霍特普三世及其王后泰伊的物件揭示了埃及在这一时期频繁的外交活动,这些外交活动与迈锡尼在爱琴世界的崛起有着密切的联系。被发现于迈锡尼的埃及精美陶瓷是来自于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礼物,这些礼物很有可能肩负着与迈锡尼文明结盟的任务。

公元前 1400—1200 年,也即从阿蒙霍特普三世到第十九王朝覆灭的这一段时间,是近东世界的迈锡尼时代,以迈锡尼文明为主体的整个近东地区的贸易十分的繁荣。迈锡尼物品出口于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每一座城镇,极其精美的迈锡尼陶器遍布于近东各地,成了近东考古学家堪定年代的标尺。这一时期不仅埃及和迈锡尼人热衷于地中海地区的海上贸易,其他国家和民族同样也对此十分的关注,来自于叙利亚的商船频繁往来于叙利亚和爱琴海诸岛,它们多以塞浦路斯为中转站。在土耳其附近海域人们发现了一艘沉没的船只,这艘船是从叙利亚驶往希腊的,船中满载着铜块、陶器、其他质地的器皿、芝麻、黄金和颜料。对于埃及来说,他们向迈锡尼出口的物品主要是谷物,以此换取迈锡尼的橄榄油和香料;而迈锡尼向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出口的物品则以树脂、油脂和各类植物油为主。由于爱琴文明在

商业贸易上的强大实力,赫梯人把当时的迈锡尼王国的国王看成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五位国王中的一个。在用线形文字 B 记载的文献资料中这位国王的名字是瓦纳克斯(Wanax)。

毫无疑问,在迈锡尼文明时代埃及一直与迈锡尼王国保持着书信联系,尽管两国之间的官方书信仍然没有被发掘出来。从阿玛纳信件中我们了解到埃及法老与塞浦路斯国王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联系,而塞浦路斯又是埃及与迈锡尼贸易的中转站。如果埃及国王和迈锡尼王国的国王不是直接保持着书信联系,那么他们也肯定通过塞浦路斯彼此之间有着间接的联系。

然而埃及与爱琴海诸岛之间的联系更多地局限于官方往来,埃及人并不欢迎来自于爱琴海诸岛的非官方人员。这是因为爱琴海诸岛都被崎岖的山地所环绕,因此这些地区的农业资源非常有限,它们的经济主要以渔业和海上掠夺为主;而爱琴海诸岛的海盗们通常以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和埃及的沿海城市为主要掠夺目标。路卡人(Lukka)和生活于爱奥尼亚海滨的沙达纳人(Shardana)都是以海上掠夺和骁勇善战而闻名于近东世界。后者在拉美西斯二世统治的早期曾进攻过埃及三角洲地区,他们的作战能力使当时年轻的拉美西斯非常感兴趣,于是在粉碎了他们的进攻后,他就立刻把他们征募到了埃及的军队中,这支由爱琴人组成的军队在卡代什(kadash)战役中显示了其旺盛的战斗力。

由于埃及与爱琴文明隔海相望,因此两地之间的联系集中表现在海上贸易和外交往来上。按时间顺序,埃及和爱琴文明之间的海上贸易和外交往来被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席克索斯王朝时期埃及与爱琴文明中的米诺埃文明的联系,这一阶段席克索斯王朝与米诺埃文明是通过塞浦路斯这一中间人来实现联系的;第二阶段是新王国时期埃及与爱琴文明中的迈锡尼文明的联系,这一阶段的早期两地之间的联系主要表现在迈锡尼文明对埃及的访问上,而埃及人对迈锡尼文明的造访似乎非常有限,从埃及新王国第十八王朝的国王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开始,埃及向迈锡尼派出了较大规模的外交使团,他们肩负着与迈锡尼贸易以及与其结盟的双重任务。埃及与迈锡尼的联盟是松散的经济贸易合作,它绝不是那种相对稳固的政治联盟。埃及与爱琴文明的贸易往来是单纯的官方行为,并与爱琴文明中的米诺埃文明的衰落和迈锡尼文明的兴起有着内在的联系。

[参 考 文 献]

[1] P P Betancourt. Dating the Aegean Late Bronze Age with Radiocarbon[J]. Archaeology 29, 1987.
[2] D B Redford. *Egypt, Canaan and Israel in Ancient Times* [M]. Princeton, 1992.
[3] V Hankey. The Aegean Interest in El- Amarna[J]. Journal of Mediterranean Anthropology and Archaeology 1, 1981.
[4] E Cline. Amenhotep III and the Aegean: A Reassessment of Egypto- Aegean Relations in the 14th Century[J]. OrNS 56, 1987.
[5] 郭丹彤. 论新王国时期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关系[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2).
[6] D B Redford. A Bronze Age Itinerary in Transjordan (Nos. 89- 101 of Thutmose III' s List of Asiatic toponyms) [J]. JSSEA 12, 1982.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of Egypt and Aegean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Time

GUO Dan- tong

(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Northeast Normal U niversity, Changchun 10024, China)

Abstract: Egypt is not near to the Aegean Civilization by land, thus the relationship of two lands is in the trading and the diplomatic come- and- go by sea.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time, the come- and- go of two land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phrases: firstly Egypt has the relationship with Minoan Culture by Cyprus during the Hyksos Dynasty; secondly Egypt keeps the 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Mycenaean culture. The alliance of two lands is a loose cooperation in trade, but not a relatively fixing alliance in politics. The come- and- go of two lands is carried out only by the governments, and has relations to the collapse of Minoan culture as well as the rising of Mycenaean culture.

Key words: ancient Egypt; Aegean civilization; trade

[责任编辑: 赵 红]